

教师月刊

2014.1

程红兵：从上海到深圳

“

当年我在建平中学做的课程变革，把国内不同版本的教材进行整合，那个相对容易一点，因为它们的话语体系是基本一致的，也没有语言障碍，但是换一个角度说，它的价值和意义还是有限的。现在这样的国际课程重构，肯定很难做，但我相信它的意义和价值。我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些有难度的事情，并把它做好。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程红兵：从上海到深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红兵：从上海到深圳 / 教师月刊编辑部编.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2
ISBN 978-7-5675-1484-3

I. ①程… II. ①教… III. ①教学研究—中小学—文集 IV. ①G632.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3983号

程红兵：从上海到深圳

主编 李永梅 林茶居
责任编辑 程晓云
审读编辑 杨坤 卢凤保
设计 刘东方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邮购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邮编 200062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密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印张 6
插页 8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一版
印次 2014年1月第一次
书号 ISBN 978-7-5675-1484-3/G·7039
定价 12.00元

出版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专栏

- 006 老师，你的教育生活美好吗 _ 周勇
- 010 旁观其外，还是置身其中 _ 李政涛
- 013 时间镜子里的观念 _ 朱永通
- 016 教育中的“等待” _ 叶菊艳

封面

- 018 程红兵：从上海到深圳

名家

- 034 章启群 什么是健全的教育 _ 李节

现场

- 045 记事 身边的“提灯” _ 周益民
发泄本 _ 张如卿
“我怎样让我的女儿对我笑一下？” _ 书华
阳光露脸了（日记连载） _ 刘发建
- 068 师道 杨文学：写一本“给学生的书”
漫谈“教师的魅力” _ 马国新
- 071 课堂 学生为什么不举手 _ 陈大伟
- 075 吴非说 学习不是为了“竞争”
- 077 朱永新答 小学大学问——答冯莉芳老师问

话题

- 080 儿童应该背诵什么
儿子，这篇课文你可以不背诵 _ 桂杰
这篇课文为什么“可以不背诵” _ 吴礼明
到底要不要背诵 _ 高子阳
儿童需要背诵经典 _ 桂杰

阅读

- 090 为什么阅读是迷人的
做一个开放的教师 _ 陆晓红
阅读的乐趣 _ 朱煜
为什么要读经典 _ 蔡朝阳
因为阅读…… _ 王木春
我需要阅读吗 _ 戴曙光
在阅读中建设自己 _ 段艳霞

人文

- 105 被哈三中往史“烫”到 _ 关文丽
109 当年的诗 _ 杨建英

视窗

- 049 校园 厦门市海沧区绿苑幼儿园
054 答问 _ 卢望军 _ 石军
058 图片 厦门海沧：阅读是迷人的
江苏常州：一本书的聚会
062 大夏 展现教育细节之美

程红兵·从上海到深圳

建构一个“世界交换体系”

文_林茶居

近期在创作一组以“兄弟”为主题的诗歌，其中写到老家渔村的一个老大哥：“这也是他的书房和会客厅 / 除了门与窗，一本书打开也有足够的光明 / 作为渔家汉子，他更为习惯 / 与朋友交换蔚蓝和开阔 / 有多少次拥抱，就有多少对世人的深情……”

我有一个体会，诗歌写作总会把我带进一个新的“人世”场景，或者说，诗让我重新认识人世与世界。“与朋友交换蔚蓝和开阔”，这是我从老大哥身上看到的气度，它使我意识到，这样的心灵状态多么重要：与大海、天空交换蔚蓝与开阔。我的意思是：一个人，应该懂得与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产生连接和呼应，让自己的生活和思想深深卷入整个世界交换体系当中。它同时意味着对故步自封、固执己见、唯我独尊、真理在握的拒绝。

这个醒悟也让我对中国近几十年来的发展有了新的认知。2001年，中国加入WTO，走上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轨道，一方面，它承担起新的国际义务，也享受到新的贸易权利，另一方面，它通过修改相关法规，调整体制和结构，变革落后的产业发展模式和企业运营模式，促进和鼓励更多的资金、技术、信息等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并与其他国家或组织产生多元而积极的交互反应，从而逐步建立起与世界接轨的市场经济体系。另外如举办奥运会、世博会等国际性活动，虽然存在规模依赖、过度消费等问题，客观上造成不少虚假的繁荣，但其对中国元素的充分建构，对外部文化的大胆接纳，包含了融入世界、与世界发生更多联系的国家冲动和期待。

一个现代国家，自然应该秉持这样的发展样态，而这同样应该是一个现代人必要的存在方式：抱持开放、容纳、吸收、对话、分享的生命机制和生活态度。它类似于植物的光合作用，既是与世界交换能量，亦是自身

的能动发展。他就是遗世独立，也依然在自然万物当中，在他自身的关切当中。除了自然、社会这些要素，寄寓于“环境”中的各种历史、文化、艺术的因子，同样也应成为其世界交换体系的一部分。

所以，如何为自己建构一个世界交换体系，并非空泛的问题，它事关一个人的视野、眼光、胸怀和精神格局。或许，只有在这样的体系中，他才可能知道什么是核心的价值，什么是珍贵的人性；才可能明确自己的责任，明识自己的心性，看见自己的局限，看清自己的边界。

教育越来越难，育人越来越不容易，这是很多教师的共同感受。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孩子，生活在一个具有越来越多的不安全感 and 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各种似是而非的风潮，各种令人目瞪口呆的事件，影响着他们的感知和判断。如果学校教育无法提供理解这个世界的方法与路径，他们就只能“向外”寻找，同时产生越来越多的“不信任”。这个时候，一个教师是否拥有自己的世界交换体系，将决定他是否可以教给学生多元文化理解和现实问题判断的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不是出门旅行、出国观光，也不是广交朋友、熟读诗文，就是与世界产生了联系。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在《语言知识》一书中提出两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其一，为什么我们获得的材料如此之少，而产生的知识却如此之多——他称之为“柏拉图问题”；其二，为什么可资利用的材料如此之多，而我们的知识却如此之少——他称之为“奥威尔问题”。按照乔姆斯基的看法，任何国家都存在“奥威尔问题”。而在作为个体的人的身上，是不是也存在“奥威尔问题”？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所了解的信息，所拥有的知识，可能都是被篡改或重组的。

从这个角度说，建构一个世界交换体系，可以让我们既保持视听敏锐，又不被流俗所裹挟，对集体动员和那些一呼百应的东西具有警觉性，减少甚至避免陷入“奥威尔问题”。我们需要经常抬起头来，看看自己，看看自己与世界的距离，看看世界在往何处走，看看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世界被建构成什么样子。

写作此文，正是北方十二月的深夜。天寒地冻，山河发呆，这也是世界的样子——它是夜色，是星语，是一个人“优美地走着”的身影，是我年关渐近的愈来愈绵密的乡愁……

专栏

- 006 老师，你的教育生活美好吗 _ 周勇
- 010 旁观其外，还是置身其中 _ 李政涛
- 013 时间镜子里的观念 _ 朱永通
- 016 教育中的“等待” _ 叶菊艳

封面

- 018 程红兵：从上海到深圳

名家

- 034 章启群 什么是健全的教育 _ 李节

现场

- 045 记事 身边的“提灯” _ 周益民
发泄本 _ 张如卿
“我怎样让我的女儿对我笑一下？” _ 书华
阳光露脸了（日记连载） _ 刘发建
- 068 师道 杨文学：写一本“给学生的书”
漫谈“教师的魅力” _ 马国新
- 071 课堂 学生为什么不举手 _ 陈大伟
- 075 吴非说 学习不是为了“竞争”
- 077 朱永新答 小学大学问——答冯莉芳老师问

话题

- 080 儿童应该背诵什么
儿子，这篇课文你可以不背诵 _ 桂杰
这篇课文为什么“可以不背诵” _ 吴礼明
到底要不要背诵 _ 高子阳
儿童需要背诵经典 _ 桂杰

阅读

- 090 为什么阅读是迷人的
做一个开放的教师 _ 陆晓红
阅读的乐趣 _ 朱煜
为什么要读经典 _ 蔡朝阳
因为阅读…… _ 王木春
我需要阅读吗 _ 戴曙光
在阅读中建设自己 _ 段艳霞

人文

- 105 被哈三中往史“烫”到 _ 关文丽
109 当年的诗 _ 杨建英

视窗

- 049 校园 厦门市海沧区绿苑幼儿园
054 答问 _ 卢望军 _ 石军
058 图片 厦门海沧：阅读是迷人的
江苏常州：一本书的聚会
062 大夏 展现教育细节之美

老师，你的教育生活美好吗

文_周勇

周勇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民国时的沈从文曾长期在学校教“写作课”。开始时他的教育生活一点也不好，他对教书找不到感觉，又不可思议地爱上了班上一位名叫张兆和的女生。之后数年，他深陷痛苦之中，直到张兆和答应与他相爱，才抖擞精神，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他认为写作教学应从描写小事物开始，比如怎样描写一朵花、一棵草或一间屋子里的空气等。

沈从文教得认真，人际环境也不错，拥有令人羡慕的爱情和花园式的学校，然而他总觉得还不够好。何止不够好，他很快就感到失望和无所适从了。且不说学校外的社会环境如何让他无奈与厌恶，连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在他眼里也变成了毫无意义的白费精力。

他的这种失望，源于对“女子教育”的观察与忧虑。那些在学校里“读书写诗”的高贵校花与闺秀们毕业后，大都变成“用‘太太’名分在社会上讨生活”的人，“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有几个同志，都是从麻雀牌桌上认识的”。想到这样的教育结果，他“总是很痛苦”。

再看当时教育界流行的新观念，到处都在提倡“人的文学”和“重新做人”的教育，却说不清、更说不好“重新做什么样的人”，只是一窝蜂地“争自由”，尤其是“恋爱自由”和“性的自由”，最终也是“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

不过，沈从文没有因为失望、痛苦而变得颓废。他让自己静下来，并给自己定了一项新的文学教育事业：他要走进“人的灵魂深处”，重新理解“爱”、“怨”、“死”等最深刻的情感体验，“等明白较多后”，“重新给‘人’好好作一度诠释，超越世俗爱憎哀乐的方式，……说明‘爱’与‘死’可能具有若干新的形式”。

几年后，沈从文写出了《边城》，以逼真生动的叙事说明了“爱”与“死”可能具有的“新形式”，其中的“爱”与“死”，皆由湘西山水一般清澈美好的人情（即“美丽目的”）汇集而成，确实超越了城市中到处可见的各种“世俗爱憎哀乐”，让他实现了自己定下的文学教育新追求，他“寂寞”的教育生活因此有了一份真正美好的体验。他的学生以及我们也因为《边城》而能得到一种人生教导——被现代世俗力量摆布的“人”，还可能体会到何种不同并且美好的爱与死。

想起舒新城。1922年“新学制”实施以来，他告别湖南小学教育界，来到上海发起“新教学实验”运动，先后在几百所中小学传播“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等美国教育家发明的现代教学制度。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师能跻身全国“新教育运动”的前沿，并成为诸多“新教学”制度的公认领袖，这算得上是一段颇有价值的教育奋斗。

更值得注意的是，舒新城的努力显示全国教育界正在兴起一种新的教育生活方式，即不是以教师的身份直接从事教学，而是以“教学专家”或“教育专家”的身份指导教师改革教学模式。遗憾的是，与沈从文以作家身份和写小说的方式创造心中美好的教育相比，舒新城选择的这种新的教育生活方式似乎更难把握，甚至根本无从把握。

在当时各路势力斗争激烈的教育体系中，教学专家的新教学理念能否决定教师如何教学呢？对此问题，叶圣陶曾在《倪焕之》中作过详细解答：先是一般教师、家长不知道源自杜威的“新教学”理念与制度是何物；接着好不容易可以实施“新教学”了，教师及学生的热情也维持不了多久；最终连教学改革领导者也认为自己做的事没有意义，改变不了当时不如意的教育与社会，只能寻找新的“教育救国”道路与方式。

舒新城的努力也像叶圣陶预言的那样。没几年，轰轰烈烈的“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运动便都失败了。舒新城的教育生活因此遭遇断裂，他必须另寻道路。但和叶圣陶笔下的倪焕之最终选择参加“革命”的激进方式不同，舒新城失败后仍是在教育领域探索新路。最终他悬置了自己曾无比热爱的那些新教学模式，成了一名“教育史”学者，试图通过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演变，探寻中国教育的前进之路。

相比于沈从文可以在《边城》中表达自己所能想到的最高尚美丽的人

情世界，舒新城纵有再多美好的人文想象，也不能将其注入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更不可能通过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创造像《边城》那样优美的人生教育，而只能发明一种供少数人继承的学问。但不能否认，他在失败之后，找到了一种颇有意义的教育生活，即回溯历史，考察当时不如意的中国教育是如何形成的。他也因此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拓荒者。

值得一提的人还有许多，如陶行知、丰子恺、茅盾等等。他们都是教师，也像沈从文、舒新城那样，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教育失望或教育失败。之后，他们有的离开教育体制去创办符合自己理想的学校，与慕名而来、志同道合的学生建设新学校，借此开拓一种对国家对自己更有意义的教育生活，不仅美好，而且大气。走这条路的代表人物是陶行知。

还有的人选择放弃那种在学校里与学生直接接触的教育生活，代表人物如丰子恺、茅盾。不过，他们都未放弃教育。丰子恺相信，作为“儿童”的学生所需要的不是“工厂”一般的现代学校制度，他也因为这一信念厌倦了学校。他无力改变现代学校制度，但离开学校的他却能以漫画与儿童文学创作的方式，为儿童提供一种充满童趣与爱心的教育生活。离开学校的他仍是一位优秀的教师，无数儿童喜欢他以漫画、童话创造的美好“新教育”。

茅盾则和陶行知有些相似，他也深刻认识到，更值得做的“新教育”乃是让都市学子及社会明白当时中国农村与中国农民的苦难，研究其中的原因，然后寻找拯救的办法。这有点像拉美教育家弗雷莱为底层人发明的“解放教育”，但在当时都市学校里根本看不到这种更有价值的教育。没办法，陶行知离开都市，与农民住在一起，并创办了晓庄师范学校。茅盾则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农民苦难生活的小说，还与进步导演合作，把它们拍成电影。二人以各自的方式创造了当时最具社会正义感和底层关怀的“新教育”。中国教育以及中国读书人的教育生活终于和千年来“沉默的大多数”形成了美好的连接。

至此可以梳理一下。以上都是从教师的角度探讨教师能创造出何种美好的教育生活，从中可以看出，无论教师身处什么样的境遇，也不管学校及社会环境是好是坏，若想拥有美好的教育生活体验，都得先对何谓美好的教育作出自己的界定。在这一点上，前面提到的民国前辈不仅作了示

范，还为后人开辟了两条不同的路径：舒新城作为“教学专家”，首选从教学形式上做考虑，认为实施美国发明的“道尔顿制”教学模式，便可创造更美好的“新教育”；沈从文、丰子恺等文人教师、学者教师则更关注教师能贡献什么更美好的教育内容。

一是钻研教学形式，像舒新城那样推广“道尔顿制”教学模式，二是在教育内容上下功夫，像沈从文或丰子恺那样，为新一代学生创造更好的文化“课本”，哪条路是通往美好教育的正途呢？1930年代的教育界曾为此展开许多争论，甚至水火不容。胡适之后的新学术领袖傅斯年就曾炮轰，“多如鲫”的“教育专家”只知道发起教学形式改革运动，弄得教育界无法安静下来升级中国教育的学术内容与质量，以至造成“教育崩溃”。邱椿、赵廷为等教育学者则一面自勉自励，一面反驳傅斯年是在仗势欺人，试图把教育专家当作替罪羊。

提起这些历史过往，是为了说明，傅斯年一系的学术精英和邱椿一系的教育专家本意其实都是希望中国教育能变好，只是争论起来便会不顾本意，况且争论背后涉及的乃是位置与资源分配，当时混乱的“国家”又不能给争论各方提供充足位置与资源，傅斯年一系能争到更高位置与更多资源，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史学与考古人才，也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重大成就（如殷墟考古），被胡适视为当时国内最成功的学术团体。与风光的傅斯年一系比，邱椿一系的教育专家尽管处境不佳，资源有限，但一直在努力为中国教育思索更好的教学机制。可惜壮志难酬，直到1940年代，他们也没能改变中国教育的状况。

写到这里，思绪很自然地又回到了沈从文、丰子恺身上。他们似乎都不是很大气的人：因为各种机缘，他们进入教育界做事，虽然反对照本宣科、心不在焉的机械教学，却并未把改革整个中国教育作为自己所要投身的美好事业；他们甚至不如陶行知果敢，连办一所自己的学校的行动也没有，看得太透了的他们只是想在边缘做点自认美好的教育。一个“做”出了凄美动人的《边城》，一个“做”出了童趣盎然的童话。

那么，今天的教师能做出何种美好的教育来呢？这又得先看教师身处什么样的教育体制。萨特、福柯等20世纪西方最顶级的思想家曾揭示，西方现代教育体制不是为了创造美好人生，相反其基本结构是由监视、控

制等恶心甚至恐怖的力量组成。另一位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则发现，1980年代以来的西方教育体制已彻底不是由教师说了算，而是被外在的“市场”所主宰，学校和教师须像体育明星那样把自己的劳动变成有人投资、购买的商品，一切教育劳动与产品的价值都必须可以准确测量和评估才有绩效。来自教学一线的教育理论家内尔·诺丁斯也指出，当代美国教育界日益转向以“数学方程式的思路来解决问题”。

在“全球化”、“国际化”等新的历史驱动机制的作用下，中国教育界也已遭遇西方教育的类似处境，此外本土还有“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体系。在此格局中，教师如何能有不同且美好的教育创造？面对个体无力改变的现实，萨特曾以巨著《存在与虚无》论证事在人为。沈从文、丰子恺等前辈的教育生涯更是直接表明：现实教育体系再不如意，教师也可以为自己为学生创造更好的教育；只要自己先把“什么是美好”、“什么是美好的教育”等根本问题弄明白，便总有办法。但在弄清这两个根本问题之前，教师或许还得先郑重地追问一下，每天起早摸黑的自己正在过什么样的教育生活，它算得上美好吗？

■

旁观其外，还是置身其中

文_李政涛

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全国教育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曾经参加过一次学术会议，聆听了一个友人的大会发言，主题与“穷人教育学”有关。他的研究扎实，思路清晰，观点也颇有新意，很能给人

启发。在会后的饭桌上，大家不约而同地表达了对他的赞许。但另一位朋友却泼了冷水：研究穷人问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需要对他们有深入的了解和同情，但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来研究和表达，是不够的，如果你关注穷人的生活和命运，自己却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恐怕……他没有把话说完，满桌子的人都静默无声了。我知道这个研究“穷人教育学”的朋友，平日生活得有滋有味：隔三差五开着名车去蒸桑拿，时不时吆五喝六地聚会打牌……此后，我不再轻言对穷人和所谓“底层民众”的关怀。

这使我想起了那位终身都在寻找“灵魂配偶”的西蒙娜·薇依，她关怀穷人并践行信仰的方式是，远离原先舒适的工作环境，投身到工厂之中，和穷苦的工人们一起劳动。最有代表性的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她长年置身于穷困潦倒、疾病缠身的穷人中间，不计任何报酬地服侍他们。她一生经手过数亿美元的捐款，但从未用于自己身上，去世前，所有的财产就是几套换洗的衣服和两双鞋。

大多数人都无法成为她们那样的圣人，我自己也做不到。我也没有权利去要求：谁要关注穷人，就必须把自己变成穷人。但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区分出两种态度：旁观式的态度和置身式的态度。这两种态度，与研究者和思想者有关，与实践者同样有关。

旁观式的态度，是谋士和术士的态度，即把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作为观察、言说和思考的对象，自己站在门外或窗外，摇着羽扇，喝着咖啡，品着茶水，向里面投射冷峻的眼光，随后从容悠闲地发表看法，或赞许称羨，或批评讥讽，间或作愤怒悲痛状，产生轰动效应，吸引大众眼球。

置身式的态度，是从门外走进来，置身于自己关注的对象之间，和他们一起思考和工作，共同体验生活中的爱与忧愁，劳作中的累与孤单，并产生“共生体验”，这种体验既是将他们彼此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也是思想者产生思想的源泉。

迄今为止，我的教育研究生涯中最大的改变，就是从“旁观”变为了“置身”，这是我长年参与“新基础教育”研究的结果。我从中获得的最大的领悟是：在与中小学教师的合作研究中，我的角色不能止于“批评家”和“鉴赏家”，而更应是“建筑家”，和老师们一起发现问题，重建课堂，再造一座座教育实践的大厦。

但这只是我和我们这个团队的态度。到德国之后，我很想知道德国的教育学教授和博士们，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德国人一向有批判的传统，从康德的“三大批判”，到马克思影响世界至今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再到将“批判”作为标识的法兰克福学派，如阿多诺、霍克海默、哈贝马斯和霍耐特等，无不以其永不停息、从不妥协的批判精神著称于世。这些批判不仅催生了理论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然而，只有批判，就够了吗？

当我向德国教育学界的同行们介绍“新基础教育”团队长年累月在学校中进行田野研究时，他们普遍有两种不同的反应：要么惊讶不解，要么无动于衷，但他们共同以或隐约或直白的方式表达了不解：为什么要这样？在他们看来，研究者可以到学校去，但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不能干预、介入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说到底，这还是一种旁观式的态度。正因为如此，致力于在了解教育实践基础上做研究的德国学者并不多见，他们还是习惯于在图书馆里，在书斋内，在文献堆中做研究。即使进入中小学，也是以“打捞者的心态”去捕捞各种有利于创制论文和专著的资料，对于学校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他们也会以传统的批判精神严加剖析和挞伐，但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则与己无关：那是你们学校教师自己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

这种旁观式的态度是一种普遍性存在。许多人都在追寻美好生活，然而，美好生活不是想象出来的，不是用文字描绘出来的，不是用理论推演论证出来的，归根到底，不是旁观出来的，而是置身其中，用自己的生命活出来的，实践出来的，即生命实践出来的。

任何理想，任何理论，都需要“生命实践”。最重要的生命实践，是以“改变”为目的的实践，在改变他人中改变自身，在改变自身中改变他人，这是教育的真谛所在。教育就是为人生的改变而生的，教育学就是为生命的改变而来的。

（师）